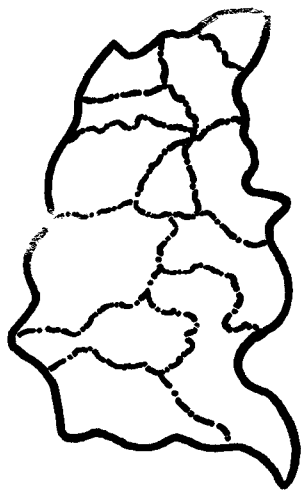


冀鲁豫党

资 料 选 编

第十七集



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冀鲁豫组

冀鲁豫党史

资料选编

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冀鲁豫组

目 录

抗日战争初期在鲁西的斗争·····	[黄居易]	(1)
回忆南镇截击战·····	庞长信	(27)
陕北营在泰西抗日根据地·····	姜渔章	(32)
抗日战争中的齐禹县一区的斗争·····	刘学民	(40)
齐禹县武工队的战斗生活·····	姜连元等	(50)
齐禹县的人民联防·····	齐晋青 倪建华	(54)
鲁西南军分区1943年的艰苦斗争·····	孟克毅	(60)
抗战胜利前后的几次战斗·····	段少勋	(82)
阳谷打狼·····	蒋守贞	(92)
鄆北常楼的民兵班·····	姬守文	(98)
在汲县掩护地方工作队·····	路永和	(108)
在抗日战争的岁月里·····	[王际鲁]	(111)
鄆北四区的群众工作·····	李荣光	(119)
群众是永不凋落的青纱帐·····	李俊龙	(124)
难忘鲁西军民鱼水情·····	汪宝进	(132)
三尺土布见精神·····	胥子英	(136)
打垮红枪会 保卫新政权·····	马国选	(137)
抗日战争中的梁二庄党支部·····	席启贤	(143)
一次漂亮的掏心战·····	杨振霄	(148)

忆在定陶战役中的一次阻击战·····	郝效亭(151)
鄆城县人民对革命的贡献·····	许正义(157)
抗日战争时期鄆城县的文化教育·····	石文歧(162)
鲁西南抗日根据地的抗属子弟小学·····	侯存明(169)
难忘的学校生活·····	乔一民(173)
冀鲁豫边区第一中学概况·····	张垓汀等(178)
回忆冀鲁豫军区一次文艺汇演·····	郑心斋(183)
回忆济鲁纸厂创建的经过·····	李孟源(190)
怀念张一帆政委·····	任耀庭 杨文碧(194)
忆战友张相一同志·····	张东里(201)
为保护通道英勇献身的红军干部管月华·····	孙合彬(204)
冀鲁豫党史文艺组八年工作小结	
·····	中共冀鲁豫党史工作组文艺组(210)

抗日战争初期在鲁西的斗争

(遗稿)

黄居易

抗日战争从芦沟桥事变开始，到今天已经42年了。每当回忆起抗日初期在鲁西那一段如火如荼的斗争生活，我的心情就久久不能平静。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是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是取得抗战胜利的决定性力量。这个胜利，是全国人民经过极其艰苦的斗争，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取得的。当年那些朝夕相处，生死与共的战友，今天有许多已经离开了我们。他们有的英勇牺牲在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汉奸的明枪之下；有的从敌人的炮火中幸存下来，却不想遭到了“自己队伍”中从背后射来的暗箭。他们之中，有的在不同时期担负着各种领导工作，更多的却是普通的共产党员和战士。正是他们，为了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的胜利和胜利后的斗争，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开通了前进的道路。他们是永远值得纪念的。

缅怀为国捐躯的先烈和同志，抚今思昔，革命道路曲折、艰辛，社会主义共和国来之不易。

我在抗日战争初期在鲁西的一段经历，只不过是整个抗日战争的汪洋大海中的一滴水。重新回顾这段历史，固然是

为了怀念过去，更是为了后人和明天。

一、投入斗争，千里辗转到鲁西

大革命后，我不断受到党的影响。1928年参加党的外围组织“协进社”；1931年参加“拓茅社”和共产主义青年团；1935年在北平东北大学读书时参加了党领导的“一二·九”运动；1936年又加入到民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行列里。“九·一八”事变后，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气焰更加嚣张。我在东大民先组织领导下，参加过一些包括罢课游行，对东大内部国民党顽固份子的斗争和南下卧轨请愿斗争。1937年“七·七”事变正式拉开了抗日民族战争的帷幕。东大的民先组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了抗日救亡活动。

7月下旬，我们部份民先队员组织起来，绕过日寇封锁线，对芦沟桥抗战将士进行了慰问。回到北平不久，大约是7月27日晚上，接到民先队部紧急通知，要我们到西山集合。由于接到通知较晚，当时已来不及赶去。第二天北平就陷落了。我们只好隐蔽待命，直到9月中旬，平津交通恢复后我们才又接到分头去太原集合的通知。我（当时名叫黄主一）和李枝伟（后改名李荒）、刘希文、王梦元、熊仲则等六七人，化名并伪装身份乘火车离开了北平。途经天津站时，日寇宪兵戒备森严，盘查甚紧，以抗日救亡份子嫌疑把我们拘留了。审讯中，大家一口咬定是流亡的学生。日宪兵司令部见既抓不到证据又审不出口供，在约一个星期后的一个晚上将我们同时释放了。当晚，我们就乘船过江，投宿设在东大

教授齐燕铭家的流亡学生联络站。第二天，转乘海轮经烟台、青岛到了济南，拟再乘火车去太原。当到达济南时，由于太原失守，民先队部要我们留在山东。8月份以来，成千上万的平津学生流亡来到济南，各种身份、各种思想、各种打算的人都有，连吃饭住宿都成了问题。当时的济南，乱糟糟一片。我们同来的人也不例外，有愿走的，有愿留的。这时，民先队部为了争取合法地位开展抗日活动，以流亡学生名义向当时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交涉开办了政训人员训练班。根据民先队部意见，我们于9月底报名考入了训练班，和同时考入的张承先、吴鸿渐、曾毅（后改名曾一凡）、王梦元等同志编在一个民先支部。

训练班设在济南市千佛山麓。每天除学习中国共产党有关抗日的方针、政策，还进行一些立正、稍息等队列训练。由于日寇飞机轰炸，几乎每天都要中断课程跑出去躲避。这种紧张的带有军事性的生活，使我们这些文质彬彬的学生第一次受到了最基本的军政训练。可惜，这个训练时间太短促了，以致后来当我们第一次拿起武器时，由于不会使用而被缴了械。由于日寇日益逼近济南，训练班只办了十来天就提前结束了。10月中旬，我和训练班的200多名同学被分配到鲁西——山东省第六行政区督察专员公署所在地聊城去发动群众，进行抗日救亡工作。

二、“初生牛犊”守聊城

由于日寇向鲁西北各地进攻，韩复榘要山东第六区专员兼保安司令范筑先撤到黄河以南去，范正准备率先头部队出

发。当我们于10月16日近黄昏达到聊城听到这一突如其来的消息时，由于大家思想无准备，吵吵嚷嚷，议论纷纷，一些人愿走，一些人要留。最后经组织决定将决心留下的解彭年、李福尧、苏赖舟、于笑虹、陈仲民、曾毅、张谭、晋士林、成润和我等共有42人组织起来守城抗战，其他随范撤离。武器是从范筑先那里留下的一些步枪和子弹。就这样，我们这42人（以后人称四十二条好汉）既不了解情况，又无实际作战经验的初出茅庐、血气方刚的学生第一次拿起了枪，凭着一股抗日爱国热情，勇敢地承担起防守聊城的任务。

10月17日凌晨，大队撤退以后，我们做了分工。我和成润分到南门站岗。上岗不久，突然出现一支队伍向我们逼近。见此情况，我慌忙取出子弹往枪里压，几次都没顶上膛，只得端起空枪大声问：“是干什么的？”对方回答：“是抗日的，自家人”。接着几个士兵快步过来说：“把枪借给我们用一下”就把我们两人的枪夺走了。其他几个城门也被他们用类似的办法解除了武装。我们42人全部被软禁在专员公署的办公室里。他们是什么部队？大家都很纳闷。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国民党第二十九军第一八一师被日寇打散后打着抗日招牌已变成土匪性质的一部份溃兵。头子是齐子修。当晚半夜，不知是谁发现这些武装土匪突然仓皇逃走了，扔下许多帽子、鞋子、绑腿、水壶等物品。大家被叫起来商量怎么办？经过分析，认为可能是日本鬼子要来进攻聊城。有前面的教训，再不敢莽撞，决定先到黄河南的东阿县去打听情况。这时天已发白，大家随即出发。途经东阿镇，渡黄河，于20日天黑前就到达东阿县城。到县城首先看到的是一片惶惶不安的撤退景象。县政府撤了，部队也走了，结果什么情况也没打听

到。人心慌乱，我们的思想也很乱。到哪里去？有坚持到冀河北的，有主张找大队的，有要南撤的。解彭年的家在堂邑，挨着聊城县境。他主张先过河到堂邑去，那里人熟地熟好打听消息。经过争论仍统一不了认识，最后确定按各自意愿行动。解彭年、李福尧、张谭、郭鲁、陈仲民、晋士林、高元贵、苏赖舟、刘昌、曾毅和我共28人（后人称“二十八宿”），由解彭年带领返回北堂邑县，在谢树岭住了几天。派出打听消息的人回来说，经我党派去的姚第鸿，张郁光争取说服，范筑先和训练班大队一起返回了聊城，新成立了第六行政区保安司令部和政训处。当时，鲁西北特委就掩护在第六区政治机关之中。政训处实际是我鲁西特委的领导机关。以后所有训练班的学员都一律归政训处领导。解彭年被委派为政训处驻堂邑县办事处主任干事，我们27人为办事处服务员。有了归宿，大家异常高兴，满怀喜悦的心情进了堂邑县。根据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精神，我们穿上国民党的军装，佩带着范筑先的符号，堂堂正正地在堂邑县开展起抗日救亡工作来。

三、鲁西第一支抗日 游击队的诞生和发展

在日军凭借强大军事力量分头大举深入我广大国土，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时，根据党的1937年8月洛川会议精神，我们则留下来，在艰苦的环境中，在敌后做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人民武装的工作，进行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战场，牵制敌人。

1937年11月，日寇开始向堂邑进攻，县政府仓促撤离。我们办事处决定转移到谢树岭一带去发动群众，组织游击抗战。当时我们的全部家当就是向县政府要来的十几支枪和很少的一点子弹。但我们信心百倍，毫不气馁。到谢树岭后曾计划收缴庄子上民团的枪支并公开打出“八路军第一游击支队”的旗号。但在向特委请示时，特委考虑到，在当时情况下收缴民团武器和公开使用八路军番号，不利统战工作，易把自己孤立起来。所以没有全都同意我们的意见，而是指示我们把将要成立的队伍借用范筑先的番号。于是以我们28人为骨干，加上一些地方党的同志和积极份子共30多人，正式成立了“鲁西第一抗日游击支队”，名义上归范筑先的政训处实际由我特委领导。因为我们没有搞过武装，经再三请求，特委又派来了经过长征的红军干部廖云山同志任队长，并建立了党的组织，李福尧任支部书记。还成立了行动委员会领导小组。我当时是排训练员，做政治工作，也参加了这个领导小组。从此，聊城地区我党直接领导的第一支抗日队伍诞生了。

芦沟桥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以国家民族根本利益为重，提出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主张。蒋介石在面临亡国危险的情况下，如果不起来抗日，不同意共产党的主张，势必为全国人民所不齿。但他又不愿意人民广泛发动起来成为人民大众的抗战，而是采取了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企图在对日作战中来削弱和消灭共产党。所以，当时国共两党合作抗日虽然形成，但仍然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局面，而不是民族统一战线政府。在这个总的形势下，鲁西这支我党领导的第一支抗日武装，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面临着腹背受敌、缺

衣少食等各种困难和威胁。由于有党的领导，每个党员和战士以坚强的抗日信念，自觉地纪律性和高度的团结互助精神，战胜了种种困难，在斗争中顽强地生存下来。

队伍刚建立，首先集中考虑的问题是发动群众，想办法扩充人员和武器。回想起来，我们在发动群众工作中经历了由不会到会，从实践中学习的过程。当时聊城地区除了范筑先的部队，到处是各色杂牌队伍，也打着抗日旗号。土匪、司令多如牛毛。老百姓深受其害，见到队伍如遇虎狼。开始时，日寇在哪里进攻，我们就把支队开到附近，想从逃难的人中招兵。结果群众不了解我们，落了空。加上坏人造谣说我们也是土匪，搞得群众真假难辨。我们走到那里，群众就跑光了。这不能全怪群众，其中也有我们不会做群众工作，没有群众基础等一些原因。抗战初期，群众虽要求抗日，但对局势还没有全面认识。不要说群众，就是我们一些人对如何开展抗日斗争也还不清楚。当时，国民党是执政党，又有几百万军队，群众对共产党尚不很了解，所以不少人把抗日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但对其腐败独裁又不满。而我们向群众讲的则是训练班教员讲的书本上的大道理：“抗日守土，匹夫有责”，“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人出人”等等。宣传上脱离当时当地群众的觉悟和实际。真金不怕火烧。我们毕竟是人民的队伍，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所到之处，替老乡担水，打扫院子，抢救受难群众，开展各种助民活动。有时实在没有吃的了，又找不到群众，就把找到的食物折价，留下钱，写上条子。群众最讲实际，不看你说得如何，而是看你做得怎样。我们的一举一动，群众看在眼里，记在心上。经过一段时间，群众逐步对我们有所了解，主动接近我

们，一些贫雇农和无依无靠的穷人开始参加我们的队伍。一个多月，队伍就发展到七八十人。枪支弹药除了从敌人手里夺取外，还陆续搞来一些土枪、鸟枪。记得有一个战士知道老丈人家里有枪，就半夜悄悄翻墙进去把枪摸出来交给支队。就这样，我们这支队伍算是初具规模。

紧接着，我们碰到的另一个最大问题就是生活上的困难。我们公开打的是范筑先的旗号，但在部队的装备、给养等方面，他们只给我们原28个政训处的服务员发很少的一点津贴和生活必须品，其他都不管。随着队伍逐渐发展，仅靠这点津贴和这点物资来维持整个支队的生活，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忍饥受饿，野菜充饥，勒紧裤带是常有的事。没有军装，我们政训处的同志就把仅有的几件军装分给新入伍的同志，其他的就穿着各式各样的衣服。天下雪了，穿不上棉衣，没有被子，更不用说棉被了。下岗回来，就穿着沾满冰雪已被冻硬了的衣服往草堆里一钻。在生活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干部和党员处处带头。领导也好，战士也好，大家轮流站岗，一样担任公勤，官兵一致，不分彼此，同甘共苦，同舟共济，有饭大家吃，有衣大家穿，有钱大家用。就凭这个，大家很乐观，照样行军打仗，我们的队伍不仅坚持下来，还发展壮大。

我们的活动和影响逐渐扩大，也逐渐成了国民党顽固派和地主民团武装的眼中钉。他们看造谣搞不垮我们，困难压不倒我们，就仗着人多，企图用武力偷袭把我们吃掉。我们看穿了他们的阴谋，采取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夜行晓宿，来往穿插的办法。有时还利用范筑先这张牌，巧妙地与其周旋。就这样，出现好多次十分危急的情况都转危为安。

了。1937年12月的一天黄昏前，我们在行军途中，突然发现地主民团武装一二千人偷偷向我包围过来。紧急中，我们退到大觉寺以这座寺院为依托，一面坚守，一面派人到特委告急。支队长廖云山沉着机智地指挥，一连打退了地主民团好几次进攻。从黄昏一直打到半夜，双方坚持不下。直到特委得到告急，找到范筑先派人来调解，才算平息下来。当晚我们转移到离大觉寺20多里的一个村庄。原想在这里休整一下，谁知刚住下不久又有消息说齐子修的队伍正向我包围过来。刚刚缓和下来的气氛顿时又紧张起来。支队部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中有两种意见：一是分散隐蔽，二是坚决顶住。最后的决定是将所有的枪支弹药都埋藏起来，人员分批转移出去。开会时我正在站岗，下岗后知道了这个决定，便提出了不同意见。支部领导又经过慎重研究，否定了刚才的决定，一面派人到特委报告，一面检查武器弹药准备转移。不久，派去的人带回了特委的指示，要我们全部人员立即带武器到聊城休整。于是，我们趁敌包围未成即刻行动，转移脱险。组织上说我能顶住风浪，以后也一直派我去艰苦地区工作。

支队到聊城经过休整后，特委根据形势的发展和统一部署，与冠县张维翰同志领导的部分队伍合编为第十支队。接受我党政治主张与我党合作的抗日爱国将领范筑先殉国后，为纪念他，又改称为筑先纵队。

四、阳谷遭匪袭，遇救幸脱险

1937年12月。一支队在聊城休整期间，一天，支部书记李

福尧告诉我，特委要调动我的工作，要我去找特委负责人张霖之接受任务。当天，我找到张霖之同志。他说，特委计划把阳谷县建成一个由党实际领导的县。公开名义是政训处领导。县长徐茂里，警察局长熊义伍都是党员。但那里没有我们自己的武装，因此决定要我去组建一个特务队。“我不懂军事啊！”我怕担当不起，担心地说。张霖之同志说：“你当指导员，另外再派个懂军事的干部赵小舟同志去任队长，你们共同负责把武装队伍组织起来，领导起来。”事情就这样决定了。当时我的心情很矛盾。要离开亲身参加搞起来的第一支队，就像要离开家一样留恋；对做新的工作又觉得不相当，在一个新的环境里，不懂还要负责，有多难啊！但是，既然组织已决定，只好硬着头皮把任务接受下来。

大约是1938年初，我们到政训处阳谷办事处报了到。一两天，申云浦同志来找我们谈关于动员组织武装的事，同时研究了特务队党支部组成名单。商谈结果，我又去向张霖之同志做了汇报。根据张霖之同志指示，特务队成立特别支部，直属特委领导，由我任支部书记，赵小舟为组织委员，熊义伍为宣传委员。行政工作归县政府领导。我是政训处服务员，还要受阳谷办事处的领导。就这样，我们很快开始了工作。不几天，申云浦就送来一二十个党员和积极分子。以后又陆续送来四五十人，一直发展到一百几十人。为了适应部队的发展，经请示特委，把特务队改编成特务大队。在部队发展的影响下，当时许多十一二岁的小鬼成天缠着要当兵，不收就不走。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把他们20来人收下编起来，组成特务大队宣传队，派人组织他们学习、唱革命歌曲，有时还上街搞宣传演出。县政府也趁火打铁，办起了政治训练

班，培养青年积极分子。我常应训练班的邀请去讲政治课。那时，县里各方面的工作都出现了蓬蓬勃勃发展的形势。

谁知，好景不长。我们越发展，国民党顽固派越嫉恨。他们策动了布永言、外号“布大眼子”为司令的一支土匪队伍近1000人，于3月3日凌晨2点前后，在伸手不见五指、天下着濛濛小雨的情况下，对阳谷县城发起了突然进攻。听到枪声后，特务大队立即集合，由赵小舟同志带领上城墙抵抗。我和几个病号及宣传队的小鬼留在队部看家。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虽经顽强抵抗，土匪还是很快疯狂地攻入了县城。当通信员回来报告说和大队断绝了联系，话音刚落，一群土匪已接近队部院子，一面开枪，一面呱哩呱喇大声喊叫。我们连忙组织还击，打了一排枪，没有顶住，一二十个土匪冲到了院门口。一个象是小头目的土匪喊了一声“搜”，其他土匪正要动手时，为了让其他同志争得时间脱险，我急忙往门口一挡，对那个像小头目的说：“你不用搜，这里我负责”。

“你是什么人？”土匪们一愣，站住了。

“我是队部写字的文书”。

“文书？”他掂着张着机头的枪对我的胸膛一指，厉声喝道：“你就是负责的，把人和枪都交出来！”

我停了一下，慢慢地说：“负责就负责，他们把枪都带走了，交也交不出来了。”

大概是他们好不容易才抓到一个活的，打死我觉得可惜，那个小头目犹豫了一下，便对旁边两个土匪说：“把他带到司令部去”。两个土匪端着枪押着我出了队部院子往北走，再往东没走多远，路过一个卖小吃的铺子，只见屋里屋外黑

压压的一群土匪挤得水泄不通。押我的两个土匪看样子已经饿极了，就押着我一起用劲挤进铺子里。我看那两个土匪只顾买东西吃，趁他们不注意一侧身挤进了店铺里屋，正要往床下躲，女店主看见了，一把将我拉住，她看看我的穿着，然后示意我从后院翻墙走。我立即跑到后院翻出了院墙。到那里去呢？一听东门枪声正紧，我想那儿可能有我们的部队，就顺着屋后的墙摸黑往东走。刚走出不远，发现后面手电筒光直晃，那两个土匪一边喊一边追过来。我见情况不妙就跑起来，土匪也追得更紧。跑到一个墙跟前，想翻跳过去躲起来，但紧急之中跳了几次都没能跳过去。这时，手电筒光更近了。在这紧急关头，我突然想到紧靠刚才跑过的路边有一个不很大的洼坑，于是急中生智，赶忙跑回去跳进洼坑紧靠路边的一侧躺下。果然，这一计成功了。两个土匪追到洼坑附近发现我不见了，就站下用手电筒前后左右照了一遍，然后继续往前追赶去了。他俩万没想到我就躺在他们脚跟前。等他们走远了，我便爬起来，拐进一条巷子。这时，只听见大街上传来阵阵搜查声，情况仍然非常危急。我便打算先到一户群众家里暂时躲避一下。谁知，家家户户都把门关得紧紧的。我个子小，院墙高，翻不进去。正着急碰巧，摸到一家门口，轻轻一堆门就开了。里面是一个空荡荡的院子，我摸到墙角又有一个门。一推，仍然没栓。我正要进去，屋里一个妇女突然惊叫地问了一声：“是谁？”“我是逃难的”我连忙答道。她立即点上灯，让我进屋，带着同情的目光注视着我被雨淋湿了的军装，又追问：“你是干什么的？”我不好说别的，只好照实说：“我是范筑先政训队的。”她没再多问，返身去烫酒给我喝。喝完酒，天也快亮了。她怕土匪来

搜查，又找来便衣给我换上才让我走。我刚出门走到离大街不远的地方，又被一伙土匪发现了。原来街上已戒严。眼看这次是脱不了身了，我只好镇定地迎上前去，再次被捕了。土匪们不管三七二十一，押着我就要到司令部去，但又不知道司令部在什么地方，就一边走一边向路上的同伴们打听。可是被打听的也不知道。押我的土匪正在不耐烦的时候，正巧碰上一个训练班学员。他也背着枪，带着布永言的袖章，看见我被押着，连忙问那几个土匪要到那里去。土匪说要找司令部。那个学员一口答应说：“你把他交给我，我带他去。”就这样，他大摇大摆地一直把我带到离东城门不远一个拐角处的房子里，找到了申云浦和其他几个同志。只见他们都带上了布永言的袖章。由于我不是本地人，不好掩护，申云浦又把我交给一个在土匪队伍中同他关系比较好的小鬼，把我送到了耶稣教堂“避难”。当时在教堂里还有宣传队的小鬼小安子（安惠林）和其他几个同志。我们在教堂里一直平安地住了十几天，等到布永言的队伍被范筑先收编后，才出城归队。

归队后才知道那天晚上大队的同志们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在城墙上坚持了七八个小时，最后才全部安全突出城去。和我一起的留守人员以及宣传队的小鬼们，在我挡住门口的土匪时也都翻墙安全脱险了。还听说，在县城被攻陷的第二天，范筑先就下令把阳谷包围的水泄不通。经多次谈判，才算和平解决，把布永言那支土匪队伍改编为鲁西抗日游击第十九支队。政训处也派了部份同志到十九支队去建立政治部。盛北光同志任五支队政治部主任，对十九支队做了组织联络工作，于是，我们又回到了阳谷县城。